

## 云南省图开展古籍保护和“国门文化”建设调研工作

**本报讯** 3月25日至29日，云南省图书馆馆长、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马云川带领4名馆员，就2020年云南省古籍保护工作、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古籍保护和“国门文化”建设工作，到普洱市、临沧市、保山市、墨江县、凤庆县、昌宁县等地开展调研。

调研组详细了解了墨江县图书馆古籍保护情况；认真听取了普洱市图书馆对区域内古籍保护工作和“国门文化”建设情况的汇报；深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图书馆（以下简称西双版纳州图书馆），实地调查傣文古籍保护情况，详细了解2019年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在

西双版纳州图书馆挂牌“傣文古籍文献提供中心”后，西双版纳州图书馆搜集散落民间的傣文古籍的进展情况，并建议由西双版纳州图书馆筹建傣文典籍博物馆，积极联合相邻州（市）县构建中国傣文文献提供中心；现场查看临沧市图书馆从民间搜购的傣文古籍；实地调研了凤庆县图书馆古籍文献的收藏保护和图书馆公共服务等工作；对昌宁县图书馆地方文献、民族古籍文献保护工作进行实地调查；认真查看了保山市图书馆的古籍保护情况，并就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等工作进行了座谈交流。此

外，调研组还到保山市收藏古籍较多的永昌阁（永子棋院），就围棋专题文献收藏、保护以及建设专题文献图书馆等情况进行了调研交流。

通过到各地走访，调研组较为准确地掌握了云南省部分州（市）、县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特别是区域内少数民族古籍收藏、保护、修复、数字化等方面的具体做法、成果和存在问题，详细了解了各州（市）、县加强“国门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建设配置需求，为下一步更好地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图书馆服务效能、推进古籍保护工作、推动“国门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云南省图书馆调研组一行调研临沧市图书馆从民间搜购的傣文古籍

## 翰苑撷珍 VR助阵 北京大学图书馆提供“云览”服务

**本报讯**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文总量为150余万册（件），善本20余万册，居全国高校图书馆古籍藏量之首，具有规模宏大、种类齐全、珍品众多等特点。为满足疫情期间读者的文献需求，北京大学图书馆以VR形式，将“翰苑撷珍——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古文展”移到线上，方便读者走近古籍、利用古籍。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古文不仅为北大教学与科研提供重要的学术资源保障，还面向社会为

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提供文献资源服务。其馆藏古籍中有完整的敦煌卷子200余号，宋、元刻本300余种，明刻本逾万种，抄、稿、写本9000余种，活字本3000余种；馆藏金石拓片4万余种、4万余件，囊括了缪荃孙艺风堂、张仁蠡柳风堂二家藏拓。

此次“翰苑撷珍——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古文云展览”以北京大学图书馆120年发展历史为脉络，以重要古文入藏为节点，选取较有代表性的特色专藏予以重点介绍，由方功惠“碧琳

琅馆”、李盛铎“木犀轩”、马廉“不登大雅之堂”、缪荃孙“艺风堂”藏拓、张仁蠡“柳风堂”藏拓、程砚秋“玉霜移”、燕京大学藏书和“大仓库”藏书八个部分组成，展示了唐代写经、宋元刻本、稀见抄本与名家批校题跋本、新入藏金石拓本等珍贵古文共计60余种。通过VR形式，读者可以像实地观展一样感受展品的分布及编排思路，且每件展品都有清晰的展品图及语音介绍，更方便读者走近展出的古籍。



特邀嘉宾：刘家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  
学院教授、古籍保护专家）

纸质藏品脱酸的筛选原则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该藏品属于无可替代的保存对象，必须保留原件；二是该藏品可以安全脱酸。

### 1. 需要保存原件的纸质藏品

除了其承载的信息内容的价值外，不少纸质藏品还具有凭证价值、文物价值、工艺价值或鉴赏价值等，这些价值是与纸张、字迹及其制作工艺密不可分的，需要保存原件才能得以体现。这类纸质藏品主要有：档案、某些书籍（如善本书、特装本、

手稿等）、工艺美术品、纸质历史文物等，这些纸质藏品大多集文献价值、文物价值、鉴赏价值于一体，很难通过复制品来完整体现其价值，是必须保留原件的。

此外，还有不少作为艺术品和文物来收藏的钱币类、邮票类、票券类等纸质藏品，也是只有原件才能完全体现出其收藏价值。

凡是这些必须保留原件的，或只有原件才能全面发挥其各种价值的藏品，若是以酸性纸承载或其纸张已被酸化，是需要尽早脱酸的。越早采取脱酸处理，其原件被保留的价值越高，越有可能延缓其使用寿命。

### 2. 脱酸是否安全可行

需要脱酸的藏品，是否可能通过脱酸达到期望的目的与脱酸是否安全是筛选的第二个原则。如有涂层的纸，由于涂层的阻挡作用，现有的脱酸技术是无法将碱性物质送达纸张内部的，即使其需要脱酸，也无法达到脱酸目的。

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脱酸技术达到去除纸内酸性物质的脱酸对象，是否可能安全脱酸，则会涉及以下几方面。

#### （1）纸张是否会受损

经过脱酸处理，纸张形体有可能受损、变形、变色或质地发生变化，这就要考虑：该对象是否可能采用脱酸处理；脱酸前是否需要修复处理；采用哪种脱酸技术较妥当。

#### （2）字迹是否受损

经过脱酸处理，字迹有可能变色或褪色，这类对象是不能采用脱酸处理的；经过脱酸处理，字迹可能出现洇化，就得考虑采用哪种脱酸技术以规避这类风险。

在脱酸对象的选择中，具有鉴赏价值的藏品是否可以脱酸及采用何种方式脱酸，其选择的条件更为复杂。尽管在脱酸处理中不会对纸张和字迹带来明显的影响，但有可能会带来细微的变化，这些细微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该藏品的美学价值，或是对先前修复的痕迹产生微弱影响，这些都会影响到该藏品的鉴赏价值。对于这类对象是否可以脱酸处理，需要评价脱酸技术能否把这类微弱的变化控制在被接受的范围内。

#### （3）粘合剂是否可能受损

若粘合剂在脱酸过程中可能受损，被装订藏品在进行整体脱酸前就要考虑安全问题。此外，已有的修补处或文献内部原有的被粘合的字条是否会在脱酸过程中脱落；若有松动，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这些问题都是在脱酸对象的选择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此外，对于书籍一类的藏品，其脱酸安全性的选择要比档案更难，这是由于书籍的载体材料种类太多且多混杂地捆绑为一体，在脱酸对象的安全性考虑上，除了纸张和字迹的安全性外，还有装帧材料等。

## 纸质藏品脱酸的筛选原则

# 我们离《四库全书》还有多远？

□甘肃 韩春平



《四库全书》编纂于清代乾隆年间，距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全书共收录当时所存历代书籍 3461 种 79309 卷，存目 6793 种 93551 卷，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因按经史子集四部编排，故名《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编成之后，共誊抄七部，分藏于南北七座藏书阁，后有一半在清末因战乱而毁散，只余三部半，现分藏于各地。本书内容虽不无缺陷，但在保存典籍、传承文化、繁荣学术等方面居功至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为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配合《四库全书》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工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于 2018 年组织北京、甘肃等《四库全书》收藏地

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开展全国性的“走近四库全书”系列宣传活动。同年 10 月，活动按计划首先在国家图书馆及部分首都高校举办，通过展板、讲座、互动体验及手抄经典等多种形式介绍《四库全书》。2019 年，京外活动也相继举办。各地举办活动期间，中央和地方媒体及时予以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举办“走近四库全书”系列宣传活动，无疑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其意义不容低估。不过与活动期间的热烈氛围相比，“走近难”的现实状况未免让人略感忧心：首先，举办这项活动，前提便是此前民众普遍不曾“走近”《四库全书》，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其次，活动的举办也很难在短期

内有效改变“走近难”的窘况。

从历史上来看，《四库全书》在成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供皇室及少数士子阅览，广大民众根本无缘接近。近代以来，《四库全书》不是因战乱而毁散，就是为避祸而转徙，幸存部分后来又被严密保藏，即便是专家学者也难得一见，遑论普通民众。早在民国初期，有识之士就曾为影印《四库全书》奔走呼号，但其愿望经久未能实现。上世纪 80 年代，“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溯阁本被影印出版，这是《四库全书》第一次化身千百，为人们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不过由于印量有限，多达 1500 册的豪华版影印本也往往被奉为珍本秘籍，以定点收藏、定时服务的模式发挥作用，不能走出小众读者的范畴。之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电子版文溯阁本开始出现并广泛传播，从而使广大民众能通过数字终端查阅《四库全书》。

但是影印本和电子版的问世，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全面了解《四库全书》，因为自文溯阁本影印流布后，学界通过比勘得知，其他三阁之书在文本上都与文溯阁本有着很大的出入。例如国家图书馆杨讷先生等曾发现，仅在集部 1273 种文献中，文津、文溯两阁本的篇、卷差异就多达 788 处；兰州大学汪受宽先生等又在已选印的文溯阁四种文献中，发现了与文溯阁本在图、文方面的差异

883 处；此外，浙江大学高明先生也曾文在文澜阁散出的一部四卷残存本《网山集》中，核对出与文溯阁本的异文 70 余处。由此可以推知，诸阁本之间的文本差异会有多么显著，如此显著的差异赋予了每一阁藏本独具的文献价值。

进入 21 世纪，文津、文溯阁本也都相继被影印出版，文溯、文津阁本还出版了仿古影印本。至于文溯阁本，虽然在 2003 年出版了选印本，但仅收录四种文献，主体部分至今仍藏在深阁人难识。多年以来，学界一直呼吁尽早影印出版全套文溯阁本，同时完成和完善诸阁本电子版。只要这两项工作没有完成，民众与《四库全书》之间依然会有难以逾越的最后一公里，四库学研究难免会倍受掣肘，各种“走近”活动也将大打折扣。因此要问我们离《四库全书》还有多远，显然无关乎空间上的距离，因为空间距离已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时间距离，不过答案恐怕只有等历史来宣布，但愿不要让大家等待太久。

在 2018—2019 年“走近四库全书”系列宣传活动中，北京、甘肃分别组织学生和专家学者参观了《四库全书》原书。这种参观当然仅具象征性，是一种短暂且被严格限制的活动。从典藏的角度来讲，必须坚持古籍文献“保护第一”的原则，“走近”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走近原书，更不会允许每位走近者都去触摸和

翻阅。但是从使用特别是专业研究的角度来讲，也不该杜绝所有人走近原书，即便有影印本和电子版替代品，也应该在保证原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少数专家学者走近原书，并特许他们动手翻阅。有时候只有亲眼目睹、亲手触翻原书，亲身感受原书气息，才能从文本、载体乃至装具等多个层面完整感知经典的生命，否则了解便只是一知半解，研究也难免隔靴搔痒。

开展“走近四库全书”系列宣传活动的初衷无疑是积极的，但“走近”意味着民众应该“主动”，在目前少数专家学者都难以走近原书，广大民众与《四库全书》之间仍旧被重重阻隔的情况下，这种主动“走近”难免会遭遇尴尬。其实如果换个思路，让文献保护、保存方成为主动者，早日打通民众与《四库全书》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把《四库全书》“推送”给民众，让文献主动走近民众而不是相反，问题将迎刃而解。当“走近”变成“推送”，《四库全书》才能由小众读物变成大众读物，四库学研究也才能获得全面、充分的发展。依此思路，我们应当尽快影印出版文溯阁本，并建成基于现存诸阁本文本内容及研究成果的优质《四库全书》数字平台，让《四库全书》走向广大民众，进而跨出国门，使这一经典巨著及其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世界共享。

九龙山里看做帘子，桃林看手工造纸，隆回看“忠良美”年画

## 一个杭州女子的隆回一日“忙”

□浙江 汪小帆

告别重庆梁平，我前往湖南邵阳隆回，去寻访李志军师傅的古法造纸作坊。

2013 年手工纸调查期间，李师傅给我们寄来几款他们那里特有的以雪花皮（瑞香科植物）为原材料的手工纸。其中有一款特别亮眼，纸张呈现出淡淡的古朴，带着旧时的清雅气息，非常适合用来修复。爱之心切，当即向李师傅电话订购。他告诉我们，这批纸样已经销售完了，不过会特地再为我们制作一批。不久，新纸送到，打开一看，纸张从骨子里透出明亮的鲜黄色，仿佛新娘子冲着婆婆喜气地憨笑，全失了原先样纸所特有的那份古朴清雅的本色。李师傅后来对此有非常委屈的解释：“汪老师，您告诉我纸张是用来做古籍修复的，所以我特别精心制作，这么漂亮的颜色，多好看啊，像迎春花似的，为什么不能修书呢？”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的疑惑，自己更加纳闷：同样是与纸打交道的人，怎么对纸的要求差距会这么大呢？也许辜负了李师傅

的好意，但这件事最后倒是让我更加明白，就中国传统的手工纸而言，即便是同一个纸坊，不，就算是同一个做纸师傅，不同时期做出来的纸都会有差异。所以我经常劝别人，看到合适的手工纸，尽可能多存一点，别指望以后还能买到一模一样的。我不知道，这究竟是经验，还是一种遗憾。

在参观李师傅的作坊前，我们先顺道拜访了已经 93 岁、专门做纸帘的陈师傅。这次访纸，不断刷新着我对民间底层手艺人生活状态的认知。陈老师傅住在一座两层的土坯房里。房内还是泥地，几只母鸡旁若无人地在屋内外悠闲踱步。周围卫生状况非常糟糕，到处堆砌着废品杂物。屋内唯一一件显眼的器物，是一张被岁月磨出厚厚包浆的、锃亮的竹躺椅。让人心酸的还有老人的袖口衣角，也如同那个躺椅一般油光锃亮。这位老师傅是当地做手工纸帘技艺最强的，至今眼不花，动作快，编织细腻紧密，远近村里的小伙子都做不过他。有人说他天生是做帘子的好手，虽说一张 80 厘米×90 厘米的帘子能卖到 2800 元，无奈现在做纸的人少了，买帘子的人相

对也就少了，老人的生活自然举步维艰。老师傅举着自己做好的帘子让我欣赏，只见黑色桐油刷过的竹丝排列细密齐整，框架上面用红色的漆字写着“陈银生造”。

比起陈师傅住所的简陋，李师傅的纸坊经过改建，现在是一个灰砖墙、黑瓦房的独立小院落。院门正上方挂着“烟冲古法”的竹制牌子，另一边是隆回县文广新局于 2016 年颁发的“滩头手工抄纸技艺传习所”牌子。院落内数幢小平房各自独立，上面分别挂着焙房、香粉纸作坊、书画纸作坊、古纸加工坊等标牌，屋后则是沤料的池子，功能区分相当明确。

参观的时候，仅有一位师傅在抄纸，我留意到水槽的上方接入了两根水管，一根是常见的塑料管，另一根是竹管。询问后才知道，竹管引入的是山泉水。在枯水季或者水量不够时，就用自来水补足。我问抄纸师傅，用山泉水和自来水有何差别。他回答：“山泉水嘛……用起来好，滑，好捞纸。”这应该是一线师傅的切身体会，无怪乎纸坊都要建在近水源处。在水槽另一侧，我又见到了石臼，里面却堆着不少明显已经成型却断裂的纸张。

李师傅在一旁不无懊恼地说：

“昨天榨纸太大力全压断了，一天白干了，得重新踩浆再来一次，还得损耗不少浆料。”这可真是非常可惜，要知道，一般要达到榨纸的数量，起码也得有五六百张纸。李师傅得知我没有看过踩纸操作，当即挽起裤腿，褪去鞋袜，现场给我演示一番。12 月的隆回，气温最高不超过 10 度，更何况在山里，想象着滑腻冰凉的浆料在脚底的触感，我忍不住缩起了脖子，也更感慨纸工之辛苦。

与梁平手工纸制作一样，这里也是采用人工压榨法。压榨法利用的是杠杆原理，以人力加压榨干抄纸中的水分。为了加大杠杆的力量，纸工们需使出浑身解数，全身联动使劲，加力转动滚轮碾压，以达到除水的效果。这无疑是一个靠体力和经验的过程，仅看到辊轴中间那段被麻绳勒出的深深印痕，就会让人有颇多感触。

近年来，李师傅除传承滩头手工纸非遗项目外，还致力于新纸的开发。比如说，他加工制作的古油纸，就是在滩头手工纸的基础上，加上某种油类物质，经过十多道工序加工而成，主要提供给文物部门用

来包裹文物。他甚至还想生产媲美宣纸的滩头纸，祝愿他成功。

辞别李师傅，我还拜访了隆回“忠良美”年画的陆显中老师。他是一名年画制作者，但更像一个底蕴深厚的藏家或者是艺术家。他的代表作《湖南滩头新刻老鼠聚亲全本》年画图，传递出幽默诙谐的气息，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作坊对手工纸进行了再加工。他使用的加工原料，也是就地取材，取当地河边特有石料，磨成细粉，再对手工纸施胶粉。让我惊喜的是，我发现他收藏的花纸老版以及部分老花纸，或施蜡研花，或刷色点粉，精美无比。陆老师告诉我，原来滩头的花纸作坊非常多，比年画还要多。比起年画的装饰功效，滩头花纸可用做包装，可做墙面，也可供祭祀之用。而现在，虽然人们收藏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年画，但陆老师另辟蹊径，收藏了几百块这样的花版，也算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滩头花纸的工艺，在清末的很多奏折上都出现过，不少档案馆都有收藏。衷心希望陆老师能够通过收藏老版恢复生产这一类型的花纸，为纸质文献的修复多提供一种可能的材料。





一头银发，步履轻捷，说一口悦耳的上海话，一举一动如行云流水，让人听着看着便觉是一种美的享受。

她是当代很多修复师口中的“大师姐”，更是众多年轻人心中的“好师傅”，从业50多个年头，从拜师到收徒，她从来没有放下过手中的“活儿”，一心传承技艺，延续古书生命。

她就是古籍修复师——潘美娣。

# 潘美娣： 故纸堆里的“白衣天使”

□本报记者 刘晓立

## 1 学规矩，练基本功，先会走才能跑

1963年，17岁的潘美娣因为身体原因，从舞蹈学校转业到上海图书馆。上班的第一天跟着领导见过师傅后，潘美娣便被分配了任务——搓纸钉。“我的师傅是被称为‘南派圣手’的曹有福，古籍修复技艺非常了得。当时已七十有三的他话不多，拿出一沓纸，自己动手搓了一个纸钉，然后说下午你就干这个。”一开始，潘美娣搓的纸钉像麻花一般，中间是实心的，跟师傅搓出的空心且直挺的纸钉相距甚远，虽然勉强可用，但她并不满意。经反复揣摩，潘美娣领悟到：书籍装订打孔时，师傅搓的纸钉头尖尾钝，外实内空，穿过书页时可以拉长，穿好之后又可以回弹，才能把书页固定，又不伤及书页。而实心纸钉散开时，没有弹性，产生力度会损伤书页。

经过一个下午的努力，潘美娣终于搓出满意的纸钉，手指已僵硬不听使唤。搓过的纸钉，装满多半抽屉。这时，师

傅才开口：“好了，不用再搓了。”潘美娣感慨道，搓纸钉的半天时间，让我享用了一辈子！第二年，她被派往北京图书馆，参加为期两年的古籍修复培训班，跟随北派高手、有“国手”美誉的张士达学习。张士达一看潘美娣搓的纸钉，马上称赞说：“这丫头搓得不错。”那个年代，师傅不会轻易夸人，这算是很高的褒奖了。

跟搓纸钉一样，修复工作中有许多细节看起来简单，实则很有技术含量，需要不断磨炼基本功，比如墩齐书页、裁书、磨刀、数纸等。“纸书装订需要先墩齐书页，就去拿馆里的废报纸练；没有工具可以将很厚的书页裁齐，师傅就给了两把马蹄刀，让自己去开口。”潘美娣介绍说：“现在马蹄刀已经很少见了，以前我们用的那种需要自己去磨，而且磨刀很讲究，磨不好就会卷口，但若磨得好，再厚的书也是一下就可以裁

好。”这些都是潘美娣入行时必须练的基本功。如今，工具先进了，修复师对手上基本功的要求也没那么严格了，但基本功真的不重要了吗？对于潘美娣来说，技术的改进恰恰需要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只有先把老祖宗好的东西传下去，才能更好地改进和提高，还没学会走就想着跑肯定是不行的。

在上海图书馆期间，除了要练基本功还要讲规矩，受到顾廷龙、潘景郑等老先生的影响，潘美娣在古籍修复的各个环节都非常细心，对古籍充满敬畏感。比如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先生要求所有人拿书、还书时一定要用书夹板捧着，且书口要朝向自己的胸口，以防走路时若书口朝外会被风吹起，从而伤害书籍；书不能靠在身上，或用下巴顶，以防汗水污染。

这些规矩与基本功深深烙印在潘美娣的身上，成为她享用一生的财富。

## 2 不怕脏，不畏难，用心用脑相结合

从17岁进入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已有50多个年头，潘美娣经手修复的珍贵古籍达万余册（件），但她印象比较深的还是两次出土文献的修复。一次是1972年，上海嘉定明墓出土一套成化年间唱本；一次是1984年，江苏太仓明墓中发现一套结成饼子状的木版古书。这些古籍深埋地下，历时既久，受潮霉烂，甚至被腐尸浸透，黏连板结为“书砖”，修复难度极大。

上海嘉定明墓中发现成化年间唱本后，因上海博物馆没有古籍修复人员，顾廷龙便派潘美娣前去支援。她回忆说，这套书在腐尸血水中浸泡时间过长，血水早已干透，书籍四周结成硬条状，如果硬揭，肯定会把书揭坏，这对书口有字的地方极其不利。于是采用了先洗，然后上笼屉蒸的办法，蒸到书口硬条状软化，在书页温热状态下，尽快把书页揭开，再逐页进行修复，最后做成金镶玉的形式保存。“这部书修复后的样子网上都能看到，但因为以前没有修复档案，都是拿来就修，很遗憾当时出土时的原样已经看不到了。”潘美娣说。

1984年江苏太仓明墓中发现结成饼子状的木版古书时，太仓县博物馆迅速派人清理，但苦于无从下手，于是包裹在一块塑胶布里，辗转送到了上海图书馆。袋子一拆开，刺鼻恶臭扑面而来，在场的人落荒而逃。“上面霉菌的菌丝都已经很长了，红的、黄的、黑的都有，飘了起来，让人看着浑身起鸡皮疙瘩，太可怕了。”潘美娣现在想起那情景还感觉心有余悸。但顾廷龙先生强调：出土古籍就是国家珍宝，不管什么困难，都要想办法修复。

潘美娣与同事们迅速制定修复方案，同样是先清洗后揭页的步骤，只是这次揭页遇到一个大麻烦，即当书页揭到最薄几层时，再也揭不开了。潘美娣采用了一种创新手法，称为“夹揭法”：准备好与书页大小相仿的毛边纸，粗涩一面刷上一层稍厚糨糊，把待修书页夹在两张毛边纸当中黏住，糨糊干了以后，双手分别拉住毛边纸边沿，均匀用力地把夹在中间的书页拉开。这时，一张书页分成两个单页，黏在毛边纸上。再把黏着书页的毛边纸浸湿，使两者分离。

“使用夹揭法，调制的糨糊浓度很关键，太稀则夹揭的纸与书页黏不住，太稠则会使书页受到伤害。糨糊要根据纸张厚薄、牢度等情况调制。”潘美娣补充说，这种方法对于民国文献的修复具有极强的适用性。比如说民国时期的报纸因两面有字，不能像古籍似的从背面补字，那就可以用夹揭的办法，把一张报纸揭开，从中间托一层纸进行加固，然后再还原回去，还是一张完整的报纸。“当然，如果纸质已经酥脆就不能再采用夹揭的办法，因为极易损坏原件。”潘美娣强调，修复就是这样，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动手与动脑相结合，稳妥一点是必要的。

太仓古墓出土文献的修复成功，在全国引起轰动。潘美娣学艺20年，修复技艺达到炉火纯青，亦得以完美展现。这一修复成果奠定了她在当代古籍修复界的地位。



## 3 出专著，勤思考，做古籍修复的有心人

潘美娣习惯于随身携带一个类似“工作日志”的小本，常常会记录下每天的工作、感想、思考和收获，不像现在的修复档案那么规范，但已经坚持了很多年。顾廷龙先生看到后非常高兴，曾在太仓古墓文献修复完成后语重心长地对潘美娣说：“你不仅要修好书，还应该总结经验，把体会写下来。”于是，1987年，潘美娣根据笔记，写成《太仓明墓出土古籍修复记》。

顾廷龙先生阅后，十分欣喜。他拿起桌上一张便笺，写下评语：“做一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足以自豪。”经顾廷龙推荐，《图书馆杂志》当年第五期刊登了此文。“顾廷龙、潘景郑等老先生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在他们的鼓励和指导下，才有了《古籍修复与装帧》专著的出版。”潘美娣的这本专著由顾廷龙题签，潘景郑作序，因内容翔实，体系完备，成为了业界权威教科书。

“我记得有一次在馆里修一部宋刻本，把整个书页展开时，书口后面一个刻工的名字显现了出来。”由于对版本不了解，潘美娣拿去请教顾廷龙馆长。顾先生一看，兴奋地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确定此书版本的又一有力证据。对顾廷龙“片纸只字都是宝”这句话，潘美娣第一次有了切身体会，也更坚定了做一个有心人的信念！

补纸染色是近来潘美娣比较忧心的问题，也是她多年来有心观察的发现。对于修复用纸的补配，《装潢志》很早就提到“宁浅勿深，念薄勿厚”的方法，“实际上大家也基本是这么操作的，但我还是碰到了几次补纸颜色过深，甚至与之连接的书页部分都被大面积污染的情况，不得不引起重视”。潘美娣举例说，曾经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看到一册前人修复的古籍，补纸是一大块直接贴上去的，这些纸有的染过色，过了若干年之后再看，补纸的颜色浅了，周围书页的颜色反而被污染变深，看上去极不协调，严重的还会影响字迹的清晰度。

对于这一问题，潘美娣认为，首先，现在补书是有标准的，如果纸质较好，则补纸与书页的连接处最好不超过0.2毫米，这样即使会出现颜色偏差，也不至于产生太大的不和谐；其次，补纸到底要不要染、怎么染，是一个需要集中研讨的问题。“现在我这样教学生们：如果要染纸的话，就干脆多染一点。染了以后，先蒸一下固色，这次用不完，就放在那儿，以后要配纸的时候也许就用上了。”潘美娣介绍说，但这不能彻底解决补纸染色带来的问题，如果有机会，还是希望大家能集思广益，开展一次集中讨论。

## 4 教技艺，传心得， 做传道授业的“空中飞人”

“让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下去”，这是潘美娣现在常说的一句话。2000年退休后，她犹如一位“传道者”，先后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与山东省图书馆，培养古籍修复人才。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后，她更加忙碌，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培训班授课，大部分时间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2013年至今，“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培养人才模式在全国推广，潘美娣又先后担任“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山东传习所、中山大学传习所、安徽传习所导师，收徒25人。

“古籍修复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需要坐得住、有耐心，需要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认可。”潘美娣常常与徒弟们倾心交谈。她认为，古籍修复不是一个“能挣钱”的行业，带不来太多的个人财富，但是能给国家和后代留下更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要从事这一行，首先要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且能够接受和认可；然后就是要对古籍有敬畏之心，在修复的过程中切不能随意发挥，凭自己的想象去做，必须时刻牢记“整旧如旧”的大原则，以保护古籍原书为目的展开修复。

对于现在的人才培养及技艺传承模式，潘美娣认为优势很明显，既培养了一批高学历的专业人才，也扩大了修复队伍，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往往高学历的人才，更愿意也适合去做研究工作，与干具体活儿的修复人员的培养方向是不一样的，需要进行一些区分；另外，年龄大的人与相对年轻的人相比，学东西的接受能力不一样，动手能力也不一样，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潘美娣看来，古籍修复与研究各有侧重，若能够较好地结合，共同服务于文化传承会更好。

# 一个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古籍保护情怀(下)

##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序

□程焕文



古籍整理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每一项工作成果都可以转化为学术成果。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我对特藏部同仁的希冀与要求。近 20 年来，他们深得其要，在古籍工作和学术研究上硕果累累，成绩斐然。

### 中大图书馆古籍编目的三个发展阶段

近 20 年来，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古籍编目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连续跨上了三级台阶。

第一个是古籍善本书目编纂阶段。在韩锡铎先生的指导下，特藏部的同仁花数年之力以四库法为基础完成了近 40 万册线装古籍的编目工作，第一次摸清了家底，实现了线装古籍的固定排架，既便于检索利用，又便于财产清点。在此基础上，韩锡铎先生建议编纂出版《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我自然大力支持，乐见其成。这部馆藏善本书目的出版亦是韩锡铎先生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竭诚服务的最好见证。韩锡铎先生因为身体原因返回辽宁以后，沈津先生到职，提议增订馆藏善本书目。于是，在沈津先生的指导下，特藏部同仁以原有善本书目为基础，增添新购善本和重新提取的善本，编纂出版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增订本)》(上下册)。

第二个是古籍书志编纂阶段。在沈津先生的指导下，特藏部同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开展书志的编纂，先后推出了《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书志》和《〈广州大典〉海外珍稀文献书志》。

第三个是版刻图录编纂阶段。2014 年初，沈津先生向我提出编纂《清代版刻图录》的建议，我欣然同意，并希望以《中国版刻图录·初编》为圭臬，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经过四年多的努力，特藏部同仁王蕾、倪莉、肖卓、陈莉、李福标、丁春华、蒋文仙、李卓、张红、凌菲霞等共同完成了《清代版刻图录·初编》的编纂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可喜可贺！

这些年，中山大学图书馆还合作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包括：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合作，耗时十年编纂完成 520 册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广州大典》；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耗时十年编纂完成国家清史编纂工程项目 400 册《清代稿钞本》、100 册《民国稿钞本》，以及 20 册《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25 册《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等，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珍藏古籍化身千百，

传之海内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研究。此外，尚有若干部有关馆藏碑帖的著作已经杀青，不久将会出版问世。

下面来说说特藏部同仁的新成果——《清代版刻图录·初编》。

### 文献保护跳出倭宋的窠臼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以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为基础，从近 40 万册线装古籍中遴选具有明确刊刻年代和刊刻者的清代刻本 1798 种、活字本 14 种、朱印本 11 种、套印本 3 种，共计 1826 种，包含经(272 种)、史(490 种)、子(324 种)、集(633 种)、丛(107 种)五大部类古籍，涵盖康熙(4 种)、雍正(3 种)、乾隆(81 种)、嘉庆(133 种)、道光(267 种)、咸丰(109 种)、同治(283 种)、光绪(910 种)、宣统(36 种)九朝刻版。每种古籍取卷一卷端、扉页、牌记书影 2 至 8 幅，共收录书影 4994 幅，并配以文字说明，记述分类、题名、卷数、著者、版本、版框尺寸、附注等内容，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学术价值的清代版刻学术成果。

明代以来，倭宋之风有增无减，仿佛非宋元旧槧不足以夸耀。民国以来有关善本的时间范围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后移的态势，下限从乾隆以前延伸到 1912 年以前已被大多数人接受，最近又有延伸到 1949 年以前之议，这是古籍保护观念的进步，但仍然没有跳出倭宋的窠臼。宁波天一阁的藏书向为学人看重，可是大家时常罔顾一个基本史实，当年范氏家族并非以收藏宋元旧槧为重，而是大量购买“当代书籍”。这些“当代书籍”数百年之后都成为不可多得的善本。图书具有历史、学术和文化三重价值，善本的界定理应三者结合，不可仅以历史价值为重，而忽略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即使要以历史价值为重，也必须以图书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时间轴上是否留下刻痕印记为准，而不在于时间的远近。举个简单的例子，巴金的《家》《春》《秋》初版本就应该列为善本，即使是莫言的《丰乳肥臀》初版本现在也应该以善本视之，不可以等到一两百年以后再将其列入善本范围，这不是文献保护和保存应有的观念。

在特藏部同仁确定编纂《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后，我时常听到他人一些不理解的声音，甚至有的国家级古籍出版机构的编辑也不以为然，认识不到《清代版刻图录》的价值，对此我只能一笑了之。清代是我国版刻图书的集大成时代，也是存世古籍最多的时代。清代版刻图书犹如一座大山矗立在我们面前，跨不过也绕不过，不能熟视无睹或者视而不见，不能顾左右而言他，只能直接面对；又犹如一座宝藏呈现在我们面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能舍近求远或者舍本逐末，守着金山银山去讨饭吃，只能不断发掘。

### 版刻图录编辑出版的发展阶段

版刻图录的编辑出版兴起于西方珂罗版影印技术在中国流行的民国时期，大抵有以下两类：一类是藏家书影，如：陶湘辑《涉园所见宋版书影》(1937 年武进陶氏影印本，共收书 39 种)，王文进编《文禄堂书影》(1937 年影印本，共收书 50 种)

等；一类是断代图录，如：《宋元书影》(民国间上海有正书局影印本，共收书 142 种)，潘承弼(景郑)、顾廷龙编《明代版本图录初编》(1941 年开明书店影印本，线装 4 册，共收书 203 种)等。总体上收书数量较少，且以宋元版书影为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版刻图录的编纂出版条件大为改善，因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北京图书馆编、赵万里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由文物出版社以珂罗版影印出版，1960 年初印，选书 500 种，有图版 662 幅，宣纸印刷 300 部；1961 年增订再版，选书 550 种，有图版 724 幅，道林纸印制 500 部，版画中的彩色画面以珂罗版套印，品质上佳。该图录选辑历代代表性雕版印书的样页，按刻版时代和刻版地区编排，展示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刻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和风格变化，在刻版书籍之后还增加了活字印本与版画部分，成为系统反映中国雕版印刷成就精华的大型书影图谱，堪称集大成之作，开启了中国版本目录学的新纪元。惜因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此之后版刻图录或者书影的编纂出版沉寂了 30 余年。

20 世纪 90 年代末，版刻图录的编纂出版再次兴起。黄永年、贾二强撰集《清代版本图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出版，共 5 册)，收录清代各个时期各种样式的代表性刻本 350 种，选取一幅书影，间或两幅，按年代先后编排，每种书列有卷数、撰人、刊刻者及刊刻年份、版框高宽等信息。周心慧主编《明代版刻图释》(学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共 4 册)，收录明代版刻书籍书影 1000 余幅、明刊版画 200 余幅，按刊行时代、地域或版刻流派排列，每种版本有简要释文。

总体来看，20 世纪古籍图录的编纂出版历史大体上呈现出每隔二三十年潮起潮落一次的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古籍事业进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自 2008 年 3 月 1 日起，国务院陆续批准公布了五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在国家的推动下，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相继编纂出版了一批印刷精美的馆藏珍贵古籍图录，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古籍图录编纂出版高潮。特藏部同仁亦曾提议编纂出版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图录，我没有首肯，原因是不成系统。可是，《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则不然，不仅可以系统地反映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清代古籍，而且可以系统反映清代版刻图书的特点，具有重要的版本学和目录学价值。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初稿收录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清代古籍 2639 种，书影 8000 余幅，后经反复筛选最后选定清代古籍 1826 种，书影 4994 幅，虽然定稿较初稿的篇幅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但是无论是在收录图书的种数上，还是在收录书影的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已经出版的所有古籍图录，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规模的断代版本图录之一。

### 创新性采用时序编排法

在古籍图录的编排方式上，潘承弼(景郑)、顾廷龙编《明代版本图录初编》(1941 年开明书店影印本)采用的基本上是版刻类型编排方法，依照分代、监本(附官刻)、内版、藩府、书院、家刻、毛刻、书林、活字、套印、绘图、附录分为 12 类。每

种书的图版之后附有跋语，说明书名、卷数、册数、作者、版刻时间、地点、刊行者、纸张、原版框大小等，并略加考证，每类前有小序。全书之后附人名、书名、室名索引。赵万里主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 1961 年增订版)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刻版，按刻版时代和刻版地区编排，收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各代刻版古籍 460 种，书影 598 幅，展示了各个时代刻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从中可看到同一时代不同地区刻印的书在字体风格上的差异以及同一地区不同时代版刻风格的延续性；第二部分活字版，收明清两代活字版书影 40 种，图 50 幅；第三部分版画，收宋元明清版画 50 种，图 76 幅。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主要是采用时序编排方法，全书按古籍刊刻时序编排，相同时间的古籍则按经、史、子、集、从分类编排。这种依照时序编排的方式能够客观而清晰地呈现清代版刻的时代变化，是古籍图录编排方式的一种创新。例如：牌记兴起于宋元，流行于明季，至清代逐渐被扉页所替代，从《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就可以十分清晰地看见这种流变。

有清一代存世古籍浩繁，一馆之图录终难反映其全貌。如何凸显其特色，是一个值得斟酌的问题。《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在古籍的遴选上科学地处理了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关系，清前期刻书相对较少则尽可能多选，清后期刻书较多则尽量精选，而总的原则是同一刻书者(官书局)同一年同一类古籍只选一种。因此，《清代版刻图录·初编》也就构成了一张全面展现清代版刻历史全貌的完整拼图。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在借鉴前人著录成果的基础上，每种古籍取卷一卷端、扉页、牌记书影 2 至 8 幅，书影所揭示的版本信息更加全面完备。每种古籍的书影同样配有文字说明，详细说明分类、题名、卷数、著者、版本、版框尺寸、附注等事项，书后附有题名、著者、藏版者索引，可谓集大成之举。

总之，《清代版刻图录·初编》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的清代古籍版本学和目录学优秀成果，堪称中华古籍图录的佳作。

(本文小标题系编者所加。作者系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文献与文化遗产管理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委员。)

